

金质勋章“民不能忘”

◎史海钩沉 □于文尚

杭州市区南宋御街二十三坊的四牌楼巷内,矗立着一座“民不能忘”牌坊,此处原有为伍子胥、褚遂良、岳飞、于谦四位先贤而建的“忠节祠”,“民不能忘”石坊是后来据文献资料还原修建的,上面记着四贤生平简要。原本那座牌坊,推测是史上最早的“民不能忘”坊。

苏州也有“民不能忘”牌坊,还是两座。一座是为汤斌建的。汤斌,今河南睢县人,顺治九年(1652)进士,康熙二十三年(1684)由内阁学士擢升为江宁巡抚。翻开《清史稿·汤斌传》:溯行,谕曰:“居官以正风俗为先。江苏习尚华侈,其加意化导,非旦夕事,必从容渐摩,使之改心易虑。”并赏赐。当年十月,康熙首次南巡至苏,谕斌曰:“向闻吴阊繁盛,今观其风土,尚虚华,安佚乐,逐末(意经商)者多,力田者寡。尔当使之去奢返朴,事事务本,庶几可挽颓风。”又赐御书及狐腋蟒服。

汤斌不负厚望,整吏治,肃积弊,毁淫祠,敦风化俗。江南殷富名声在外,赋税沉重使百姓不堪重负。汤斌查明实情,据实奏报,先后奏免赋额数十万两。汤斌天性淡泊,生活崇尚俭朴,终年以韭菜、豆腐羹下饭,百姓昵称“豆腐汤”。巡抚江苏两年,凭着“豆腐汤”之道,赢得了百姓爱戴。汤斌离任返京,苏州民众哭泣挽留未成,停市三天,拦路烧香为他送行。乾隆元年(1736),赐予汤斌谥号“文正”。为铭记这位勤政爱民好巡抚,苏州百姓在接官厅建“民不能忘”石坊,1976年因防震拆除,2009年在百花洲公园重建。

另一座是为李秀成建的。太平军进苏,李秀成立志“舍死一命来抚苏民”,和平手段不伤百姓。苏南地区田赋极重,民不聊生。李秀成将民众苦状陈奏,天王下诏减轻了田赋。苏州士绅和民众自发为他在阊门外建了一座汉白玉“民不能忘”牌坊。“准勇”攻克苏州后,李鸿章查问此事,“民以减粮对”,李下令拆毁了牌坊。

潮州的“民不能忘”牌坊则是纪念两位知府。清道光二十二年(1842),韩江洪水,广济桥,俗称湘子桥被冲垮。后经维修勉强能通行,但“过客皆叹其病涉”。道光二十七年(1847),刘浚出任潮州知府,为百姓安全渡桥,主持重修广济桥,可不久因升职离开潮州。此后,盐

运分司吴均代理潮州知府,接修继续修桥,带头“捐廉五千金”,盐商、富户齐聚力,于道光二十九年(1849)竣工。百姓不忘刘、吴功德,集资在桥上修建“民不能忘”坊。光绪间敕建专祠于广济楼,立“民不能忘”牌坊于东关外广济桥。2007年重建于东岸桥头。坊额上款“为清道光太守刘浚、分司吴均建”,“民不能忘”的“忘”写作“恣”,乃忘的异体字,以“心上有人”会意。

南京曾有一座“民不能忘”坊。曾国藩逝世后,南京建了曾公祠,莫愁湖建有曾公阁,又在汉西门外建了一座“民不能忘”牌坊,上书“赠太傅、太子太保、武英殿大学士、两江总督、一等毅勇侯曾文正公遗爱之坊”。该牌坊部分构件,现仍保存于莫愁湖公园内。

北方也有“民不能忘”。荣膺者廖楚璜,曾被选送日本留学。宣统二年(1910),舒兰设县,廖出任首任知县。就任后即发出了舒兰最早的戒烟(毒)令,次年戒完。1910年冬,东北鼠疫,廖知县不避凶险,深入疫区,采取尸体集中焚烧、封屯儿等雷霆手段,阻止了瘟疫肆虐。这场世纪大鼠疫,共造成东北6万多人,吉林2万余人死亡,但舒兰仅“110余人死于鼠疫”。留学归来的廖楚璜深知教育之要,在县城设立劝学所督教,又创立了舒兰县初、高等小学及其他四所官立小学,鼓励私人办学,为舒兰教育奠基。1912年廖离任,舒兰人民感念廖公,夹道相送并为他树碑,正面镌刻“廖公纪念碑”,背面则刻“民不能忘”。

“民不能忘”有坊有碑也有匾。樊城的汉江土堤遇洪即溃,清道光年间,郑敦允任襄阳知府后,决心改土堤为石堤。然而,樊城的堤防不在官银修固之列,郑敦允组织募捐,参与者数以万计。1830年冬,石堤终于修成。道光十一年(1831),一场亘古未有之大洪水后,新堤



杭州南宋御街二十三坊四牌楼巷“民不能忘”牌坊

塌陷过半。已调任武昌粮储道的郑敦允闻讯,执意回任原职,完成未竟之愿。百姓听说郑公回襄阳,“走迎三百里,日夜牵挽而至”。郑返回后,立即修堤,日夜巡视,积劳成疾,于次年不幸离世,“民哭公,如哭私亲”。去世的第三年,襄阳百姓自筹资金,于公馆门外建郑公祠,在条石驳岸正中镶嵌刻“民不能忘”石匾。

“民不能忘”受捧并成一道美景,盖因其含金量高。它萌于《大学》“道盛德至善,民之不能忘也”之善境,发乎百姓心灵深处之情感。它不是官对民的要求,而是百姓间的叮咛,是官员不能忘民真情投入的“爱出者爱返”,也是民为官颁授的金质勋章。

为官之道在爱民。民不只有仇官,也爱官感恩官。若说仇,仇的只是那些尸位素餐、渎职滥权、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、奸佞宵小。而民之所爱,正是那些亲民爱民、为民惠民的忘我者。民心似镜,读人若秤,悉如苏州百姓,孰好孰恶门儿清。官民之爱不是单向单为,而是双向互为。就像异体“恣”字,官“心上有民”,民“心上有官”,世间便生“民不能忘”。古贤如此,当代焦裕禄、孔繁森、谷文昌、杨善洲等优秀领导干部再证实。

鲁迅的喝茶人生

◎两浙人物 □刘阮

人们都知道鲁迅先生嗜烟,但鲁迅之嗜茶恐怕不亚于抽烟。可以说,喝茶陪着鲁迅的一生,在他的日记中就频频出现有关喝茶、买茶的记述。鲁迅曾写过一篇名为《喝茶》的文章,说道:“有好茶喝,会喝好茶,是一种清福。不过要享这清福,首先就须有工夫,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感觉。”

鲁迅早年在日本东京留学时就爱喝茶。因为随时要喝茶,需要随时用开水,所以鲁迅的房间与别人不同,就是在三伏天也必须安置一个火炉。这个火炉其实是一个炭炉,外有方形木匣,灰中放着铁三角架用来安放开水壶。当时鲁迅所用的茶叶大抵是中等的绿茶,玉露以上的好茶,粗的番茶,他都不用。

在北京教育部任职时,鲁迅经常爱去的喝茶处所主要是在大栅栏一带,观音寺的青云阁、廊房头条的劝工场、东安市场的中兴茶楼等地都留下过他的足迹,后来也常到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去喝茶。鲁迅去得最多的地方是青云阁,并非此地有什么特别之处,而是因为它顺路。1924年5月11日,鲁迅拜访孙伏园,两人坐到下午才出去喝茶,又遇到别的友人,一直喝到很晚。当时鲁迅在教育部确实有些无聊,于是养成了经常外出喝茶的习惯,以至于后来去西安讲学期间也“往公园饮茶”。在鲁迅的诸多朋

友中,许寿裳、刘半农、钱玄同、孙伏园等人都有与其品茗的经历,边喝茶边聊天,无非是闲谈、叙旧、约稿、交换对时事的看法等。

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外出喝茶的次数并不很多,但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则较频繁。在广州的8个多月里,有记载的喝茶就有13次以上。鲁迅曾到大观园、大新公司、拱北楼、山泉、在山茶店等处喝茶,其中陆园是鲁迅去得最多的地方。

1927年10月鲁迅到上海定居后,外出喝茶的频率明显减少了。在上海的9年多时间里,有记载的喝茶仅9次。鲁迅前往茶店或者咖啡店喝茶,多半是有事,而不是纯粹的休闲。这时候鲁迅和许广平已经组织了自己的家庭,更多时间是在家里喝茶。鲁迅平时喜欢在晚上写作,开始写作前,先泡上一壶茶,在书桌旁边的藤椅上躺一会,闭目养神,打打腹稿,然后再动笔。到冬天时为了防止夜深茶凉,许广平特意缝制了一个棉茶壶套,夜里套在茶壶上,这样茶就可以保温。鲁迅喝茶有自己的特点,他喜欢大口大口地喝,茶要浓,口感要重。他追求喝茶的自然朴实,排斥把喝茶作为品质生活的装腔作势。因此,他不喜欢斟斟慢慢饮的功夫茶,拒绝慢悠悠的鉴赏。

在家里喝茶,就不免要自备茶叶。在茶叶方面,鲁迅对杭州的龙井多有偏爱,也喜欢普洱。早年在北京时,他常去稻香村买茶叶,也到

鼎香村等处买,每斤价格基本在1元左右。从他买茶的频率看,他每月喝茶约1斤。晚年在上海时,买茶叶已经不是1斤2斤地买,而是更多。有时人亲自去买,有时委托他人代买。据鲁迅日记记载,1931年5月14日,“以泉五元买上虞新茶六斤”,紧接着第二天又“买上虞新茶七斤,七元”,两天时间就买了13斤茶叶。这还不算多。1933年5月24日,“三弟及蕴如来,并为代买新茶三十斤,共泉四十元”。一次就买了30斤茶叶,而且价格还不便宜。

鲁迅之所以要买这么多茶叶,不是为了做生意,也不是单纯为了自己喝,而是送人,如内山完造、周建人等人,其中送给内山完造的许多茶叶是用作施茶用的。当时,内山完造在上海内山书店的门口设立了一个施茶桶,向路人免费供应茶水,需要大量茶叶,鲁迅是这项活动的支持者和赞助者,所以买了许多茶叶赠送给内山完造。

从早年开始,亲友就常常赠送或寄赠茶叶给鲁迅。早期经常送茶叶的是宋琳,他是鲁迅的老乡,又是学生,后与鲁迅同事,感情深厚。后来,其他人如学生加同事李仲侃、亲密弟子许钦文、女作家葛琴、老朋友林语堂、未名社弟子台静农、厦门大学同事毛瑞雪、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、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等都曾给鲁迅赠送过茶叶。所以,鲁迅的嗜茶在朋友圈中是尽人皆知。

宁波帮和“洋泾浜英语”

◎史林探微 □金锡逊

旧时,阿拉丁宁波人常常笑话有人英语念得不伦不类,念得硬邦邦,人们就把那些念不准的英语叫做“洋泾浜英语”。

考据一下“洋泾浜英语”的来历,实在是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,特别是和宁波人在上海的商业发展史相关,也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兴起相关。

历史记载是这样的:1843年11月8日,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乔治·巴富尔到上海,第二天,即与上海道台宫慕久议定11月17日作为上海正式开埠日。12月19日,英国驻宁波领事罗伯聘率军舰轮船各一艘,进入宁波港。1844年1月1日,宁波正式开埠,指定江北为外国人通商居留地。这是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中国大门后令人痛心的屈辱一幕。

由于当时上海的进出口贸易远远超过宁波,而且,那时太平军攻进了宁波等地区,宁波的商人不少逃往上海,并在那里聚集起来,这就形成了宁波帮。

当时上海的买办有宁波帮、广东帮、江苏帮等几大集团。宁波帮买办后来能接替广东帮的头把交椅,主要原因有两点:

其一,浙江是生丝的重要产地,宁波人做生意有着传统优势,古代就有开拓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美称,并在长江流域有着广泛的业务联系。宁波开埠后出口生丝数额每年不断递增,利润相当可观。因此,与外商的关系有进一步发展。而广东帮控制的茶叶出口则由于印度的竞争而开始衰落,与外商关系逐渐疏远。

其二,洋行急于要在中国市场倾销洋货,就迫切需要利用上海钱庄这样的旧式信用机构。由于钱庄通过宁波人深入了内地,宁波帮就越来越取代了广东帮,操着浙江口音的人逐渐取代了广东人。

宁波人杨坊本来只是一家绸布店店员,为了躲债,被迫流浪到上海。谁料他的一口“洋泾浜英语”,为他敲开了财神庙的大门,他轻易地进入了英商的怡和洋行,做起了买办。

洋泾浜原指上海县城以北郊区的一条黄浦江支流,这条支流分浦东、浦西两段。当初洋泾浜两岸中外商贾云集,有一些略通几句蹩脚英语的人,就充当翻译,在中外商人之间周旋,促成买卖,获取酬金。上海人称他们是“露天通事”(马路翻译)。这些“通事”使用似洋非洋的话,以汉语语法拼凑成简单的英语,于是被称为“洋泾浜英语”。当时就流行着上海话和宁波话拼凑的中英文歌谣:

来是“康姆”(come),去是“谷”(go),廿四块洋钿(钱)“吞的福”(twenty-four),是叫“也司”(yes)勿叫“拿”(no),如此如此“少咸鱼少”(so and so)(宁波话“咸鱼”发音近似“爱恩”),“沙”读似少,真崭实货“佛立谷”(fully good),洋行买办“康白度”(comprador),翘翘翘翘(tea)请吃茶,“雪堂雪堂”(sit down)请依坐,烘烘薯薯叫“扑铁壳”(potato),跑街先生“忒老夫”(shroff),麦克麦克(mark)钞票多,毕德生司(empty cents)当票多,自家兄弟“勃拉茶”(brother),爷要“发茶”(father)娘要“卖茶”(mother),丈人阿伯“发音落”(father-in-law)……有趣吧!

今天看来,历史上那种“洋泾浜英语”既引人发笑,又使人难忘那段商业历史,也算是宁波人在商业上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物吧。

现在,我们有强大的祖国,繁荣的内、外贸,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。动车代替了骆驼,巨轮换去了风帆。还有无数计的满口流利英语的大学毕业毕业生工作在国内外,“洋泾浜英语”已经成为了历史,同时又是一段不可忘却的酸涩史,因为它在语言学的角度见证了列强的侵略。

◎史林偶拾

当老师就得有耐心

□唐宝民

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天,作家卞毓方跟师姐林江东去拜访欧阳中石先生,林江东请欧阳先生题写书房匾额,欧阳先生便开始写,卞毓方在旁边默默地看。

卞毓方记述道:“先生展纸,拈笔,正要动手,有客到,推门就进,旋风一般,带着夸张的笑声。是女客,人到中年,正向老年过渡,且有来头,派头,后面跟着一个小伙,抱着大捆书法作品。入室,寒暄,我听明白了,女客是先生的崇拜者,也是书法爱好者,近来要在某大场合搞展览,先请先生评点评点。说罢,就指挥小伙把作品展开,也不管先生是否愿意。”

卞毓方接下来写道:“先生岂能不愿意。他转身,弯腰,恭恭敬敬欣赏。小伙翻一张,他赞一声‘不错,不错’,翻两张,又赞‘这笔写得好,那笔也好’,翻到第三张,先生自己动手,拉过作品,挑着看了几幅,说:‘大体不错,搞展览,没问

题。’女客要的就是这句话,笑道:‘这可是您说的。’但她仍不满足,定要先生从头到尾一张一张挨序看,先生无奈,唯有从命,待一张一张看完,中间也点拨了几句,诸如应该如何结体,如何用笔等等。客人满心满意,又带着夸张的笑声离去。”

卞毓方实在忍不住了,就说道:“她还在学习阶段,这字展给谁看?”欧阳先生说:“能写到这份上,也不容易,哪能个个都成为书法家。”

“五六十张,一张一张看,多费工夫啊!”卞毓方想说的是“多误事啊”,因为浪费了欧阳先生的宝贵时间。可欧阳先生却说:“该费就得费,我是老师,老师就得有耐心。”

作为大师级的书法家,欧阳中石先生的时间是极其宝贵的,但当有人找上门来向他请教的时候,他不但没有推却,反而仔仔细细地进行了指点,让我们看出了他在为人处事过程中的耐心。“我是老师,老师就得有耐心”,这句话说得得多好啊!

张友鸾巧拟新闻标题

□周惠斌

张友鸾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报纸编辑,早年担任南京《新民报》总编辑时,就以善于编写新闻标题而著称报界,即使一则简单的气象短讯,标题一经他加工处理,往往别有韵味。有一年,南京连日阴雨,张友鸾听完气象预报,挥笔写下“潇潇雨,犹未歇,说不定,落一月”的标题,雅俗兼顾,琅琅上口,化平淡为神奇,让人过目难忘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国内抗日呼声此起彼伏。张友鸾为一篇新闻报道拟定了一个标题“国府门前钟声响,声声请出兵”,旗帜鲜明地站在广大民众的立场上,强烈要求政府出兵抗日,表达了一个报人炽热的爱国情怀。一次,某社

会机构为前线士兵发起募集冬衣活动,张友鸾在刊发这条新闻时,借用元曲小令配制了一条标题“西风紧,战袍单,征人身上寒”,信手拈来,涉笔成趣,为征稿活动发挥了力所能及的宣传作用。

抗战爆发后,《新民报》迁往重庆,张友鸾出任主笔、经理,披挂上阵,主编社会新闻。彼时,前方军民浴血抗战,后方达官巨贾却花天酒地,纸醉金迷。《新民报》在刊发一则揭露国民党官员生活奢靡的消息时,张友鸾写下了“前方吃紧,后方紧吃”的标题。“吃紧”反映前方战事残酷激烈,“紧吃”揭示后方权贵醉生梦死,构思奇巧,别出心裁,读者无不拍案称绝。

辜鸿铭受刺激学国学

□姚素川

在国外求学时,辜鸿铭精通西学,熟谙九种语言,可惜多年在外,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研究。

有一日,两江总督张之洞做寿,府中大宴宾客,在张府充任洋方案(外文翻译)的辜鸿铭发现同是幕僚的沈曾植对他有不屑之色,忙问其故。沈曰:“我一肚子国学,你要赶上我,还需再读二十年中国古书。”

沈曾植的话极大地刺激了辜鸿铭,他也知道国学是自己的短板,于是在张之洞的支持下,开始苦读四书、骚赋、诗文,且20年坚持不懈。加之辜鸿铭记忆力超强,许多典籍他都能倒背如流,真的堪称满腹经纶。

林徽因写论文别具一格

□吴吴军

林徽因是一代才女,也是著名的建筑学家,她不仅具有诗人的想象力与美感,同时具有科学家的缜密和求实精神。

同样是写论文,林徽因写的论文和别人的很不一样。林徽因的气质里有东方的典丽之美,她通晓英文,对汉语和古文的修养造诣也颇深。林徽因把枯燥的学术论文当成美文来写,她笔下的木石结构有了灵性,字里行间流淌出诗样的韵律。

林徽因在她的《平郊建筑杂录》这篇论文里写道:“无论哪一座巍峨的古城楼,或一角倾颓

的殿基的灵魂里,都在诉说,乃至于歌唱。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化,由温雅的女儿佳话,到流血成渠的杀戮。他们所给的‘意’的确是‘诗’与‘画’的。但是建筑师要郑重地声明,那里面还有超出这‘诗’‘画’以外的‘意’的存在。眼睛在接触人的智力和生活所产生的一个结构,在光影恰恰可人中,和谐的轮廓,披着风霜所赐予的层层生动的角色……”“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,让不知名的乌鸦盘旋?是谁笑成这万风铃的转动,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摇向云天?”

诗歌的灵感、哲学的思维、历史的沉积一起涌向笔端,她的论文写得别具一格。

◎老照片

每一幅照片背后,都有一个故事
每一个故事后面,都有一段历史



上世纪60年代石门镇

桐乡市石门镇是典型的江南水乡,一条杭州塘穿镇而过。石门镇历史悠久,相传春秋时吴越相争,垒石为门,置石门为吴越限,因此得名。图为上世纪60年代石门镇一景。 照片提供者:江新诗